

# 中美关系

## 美学者为拜登政府如何应对中国提建议

CNN 近日登载欧亚集团中国和东北亚负责人迈克尔·赫森 (Michael Hirson) 等的文章《拜登该如何应对中国?》称, 美国下届政府应对中国采取“巧政策” (Smart Policy), 而不仅是强硬的政策, 并为下届政府和国会的对华政策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 对华政策眼光放长远。美国当前的政策是使用工具单边对抗中国, 而未首先策划一个可持续的战略。拜登政府和国会需要将特朗普政府的坚定态度和利用美国盟友的战略结合起来。

第二, 投资国内优势领域。美国需进行必要的投资以保持技术优势。美政府可以避免硅谷这样的传统中心, 资助“红色州”和其他地区的创新中心, 从而刺激当地经济发展并改善收入不平等。

第三, 对华态度坚定而不极端。政客们现在几乎将所有涉华问题都描述成国家安全威胁。如果做得太过火, 这些论调会削弱美国的道德权威, 并在其他方面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第四, 加强国内治理。虽然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 但其政治失灵让世界怀疑美国是否会继续保持主导地位。与中国的竞争不会弥合两党的政治分歧, 但两党都应努力表明美国能够做好国内治理。

## 美学者分析民主国家科技联盟的利与弊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近日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史蒂芬·费尔德斯坦 (Steven Feldstein) 撰写的文

章《民主国家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数字崛起？》称，一些外交政策专家提出美国应组建一个民主国家科技联盟“T10”或“T12”来对抗中国的数字野心，但该策略是否可行仍需斟酌。摘要如下：

首先，科技联盟的目标是什么。政策制定者应将该组织的目标限定在一系列核心问题上，否则其价值值得怀疑。如果主要目标是地缘政治，那么其结构应有利于促进情报共享和安全伙伴关系，并阻止中国在关键领域的进步；如果是推进民主规范，那么其应强调外交和规范方面的考虑。但该联盟很难同时成功实现这两个目标，因为这些问题的范围不同，且政策制定者们可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和资源有限。如果议程过于广泛，那么该联盟很难实现其任何一项优先事项。

其次，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小型联盟是否是对抗中国数字崛起的最佳方式。这样一个由 10 到 12 个国家组成的小集团将把印度尼西亚、巴西等众多数字“摇摆国”排除在外。这会导致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数字竞争的战场仍缺乏代表性。因此，利用一个主要由西方科技民主国家组成的精英联盟来对抗中国在全球的技术影响力，而非追求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模式，似乎有违常理。

此外，拟议的“T10”或“T12”联盟成员国之间不同的技术前景很难调和。例如，欧美在如何看待隐私、政府监管和数据使用等核心问题上存在根本差异。因此，更简单的第一步应该是集中精力修复老盟友之间破裂的关系，而不是创造新的联盟。

最后，在担负起科技政策的全球领导地位之前，美国需要明确自己的方向。美国国内对科技政策的共识似乎正在瓦解。如果不先解决内部矛盾，并在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上更清晰地阐明自身政策方向，美国就不可能令人信服地领导一个民主科技议程。

## 美学者称美需警惕中国扩大与拉美地区的安全接触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期登载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拉美研究教授埃文·埃利斯(Evan Ellis)的文章《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安全参与》称,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安全接触逐渐增加,美国应该引起重视。文章向美国决策者提出以下建议:

在回应中国在该地区扩大安全参与的过程中,美国必须尊重其地区伙伴,但又要区别于这些伙伴与中国接触的方式,要基于平等机会和法治框架,在公平竞争环境内以透明的方式进行。

美国需要令人信服地提出该地区的主权国家与中国进行安全接触所涉及的风险。同时,美国必须提供资金充足、灵活且可靠的替代方案。在寻求对中国在拉美的安全参与加以限制或与中国展开竞争时,美国还须以全政府的方式来应对。

预计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参与仍将继续扩大,美国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其带来的影响,并准备好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反击中国的活动。在针对涉及中国的冲突制定计划时,美国应切合实际地处理超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管辖范围的情况,并将解放军部队正在开展行动的其他地区纳入考量范围。

中国在拉美的安全参与不应被视为美国“后院”面临的一个孤立威胁,而应被视为中国对美国 and 当前世界秩序发起的更广泛挑战的一部分,因此,需要制定协调一致的全球战略来应对。

## 坎贝尔等称美国可利用中国挑战来扭转衰落之势

外部竞争对手的到来往往会推动美国“做最好的自己”。美国可以借团结一致应对中国挑战来扭转衰落之势。

《外交事务》期刊网站近期登载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

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库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的文章称，美国可借应对中国挑战来扭转衰落之势。文章摘要如下：

“衰落主义”或认为美国的卓越地位正在不可逆转地下滑的观点有其吸引力，但这种宿命论是错误的。美国仍拥有令人羡慕的优势，包括有年轻的人口、金融主导地位、丰富的资源、和平的边境、强大的联盟和创新的经济。此外，美国拥有非同寻常的自我纠正能力。

对美国来说，衰落与其说是一种状况，不如说是一种选择。这条下坡路贯穿了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体系。与此同时，摆脱衰退的道路可能要经过一个罕见的、两党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美国需要应对中国挑战。

中国挑战在大多数方面都不是一种选择，中国的体量和日益增长的全球野心是地缘政治事实。但不同于与苏联的斗争，美中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迎接中国挑战需要对美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进行再投资。这一点对于美国国内复兴和工人阶级的繁荣也至关重要。

政策制定者应该将这两项议程联系起来，不是为了放大美国人的焦虑，而是要清楚地表明，完成美国最重要的国内任务也会对外部产生有益的影响。与此同时，决策者必须抵制夸大美国竞争对手的做法，调整应对策略，在不引发恐惧和偏见的情况下刺激创新。外部竞争对手的到来往往会推动美国“做最好的自己”。如果处理得当，这种情况可能再次发生。

那些预测美国将继续衰落的人忽视了美国相较于中国的优势。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经济增长放缓，货币影响力仍远不及美元。他们也可能低估了美国的吸引力。美国的开放吸引了盟友、移民和资本，美国的软实力来自于其开放的社会和公民信条，而

非国家本身。

不过，仅凭美国的优势还不足以阻止其衰落。如果美国真的衰落了，其根源将是政治上的，因此这是一个关于选择的问题。对华政策为做出改变带来了机会。中国越是自信、压制，美国公众和国会就越有可能团结起来，关注中国的长期意图，以及中国政府支持的重商主义对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影响。

为了在美中竞争中取胜，两党许多决策人士现在都认同美国需采取行动。华盛顿需重建因一些人的善意忽视和另一些人的反政府意图而削弱的国家，必须重新考虑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两党许多人现在都承认，单靠市场力量无法消除不平等、维持增长、保障国家安全，或确保有能力与中国国有龙头企业竞争。

如果拜登政府以上述方式打中国牌，它必须非常小心。与中国竞争不需要对抗或“第二次冷战”。美国有责任保护亚裔美国人不受歧视，必须避免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或华裔美国人混为一谈，并及早发出明确的信息，即煽动行为和种族主义是不可接受的。

若通过建设性的对华政策，美国在国内加强了实力，在国外提升了竞争力，就能开始扭转美国衰落的形象了。但美国不能就此止步，必须找到积极的方法，重建团结和公民身份，使民主发挥作用。

## 美国外交

### 约瑟夫·奈：美国面临深层次的信任问题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近日登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文章《拜登政府会被信任吗？》称，当选总

统拜登上台后面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的盟友们怀疑特朗普是否是美国民主衰落的征兆。文章摘要如下：

民调显示，特朗普时期美国软实力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从短期来看，拜登可以重获盟友的信任，风格 and 政策的改变将提高美国在大多数国家的地位。拜登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发表的声明和执政团队的任命也对盟友产生了极大安抚作用。拜登计划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和世卫组织，以及他对北约的保证，会立即对美国的软实力产生有益影响。

但是，拜登仍将面临更深层次的信任问题。许多盟友注意到美国政党的极化，质疑美国民主是否正在衰落，美国人民是否会在 2024 或 2028 年选出另一个特朗普式的领导人。

幸运的是，相较于国内政策，美国宪法在外交政策上给予总统更大的回旋余地。所以，在短期内合作将得到改善。美国能否重获盟友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对疫情的控制、经济恢复水平以及拜登应对国内政治极化的政治技巧。

## 美专家分析 2021 年美日同盟的五大优先事项

美国进步中心网站 12 月 2 日登载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帮办迈克尔·富克斯 (Michael Fuchs) 等人的文章称，美日同盟仍是美国亚洲战略的关键支柱，处理好以下五个优先事项有助于有效推动美日同盟增进两国共同利益：

一是加强全球卫生合作，防范和应对新冠疫情。首先美国必须重返世卫组织。美日需要与其他伙伴合作，提高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确保疫苗分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提高大流行病预防水平，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二是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将有大量工作

要做，包括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引领国际社会对抗气候变化，努力使美国在 2050 年实现净温室气体零排放。美日应放弃以化石燃料为中心的能源伙伴关系，建立清洁能源伙伴关系。

三是应对来自中国挑战。美国首先需要阐明其对华政策，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必须与日本协商，两国可以针对中国挑战的各个方面制定协调一致的政策。

四是加强亚洲的多边机制。美日需要增强利用区域机构解决共同问题的能力。明年美日面对的一项关键优先事项是强化地区机制，尤其是东盟和东亚峰会，拜登应承诺参加年度东亚峰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美日应与亚洲盟友紧密合作，制定计划革新东亚峰会机制。

五是应对朝核危机。美国需要协调日韩关系，推进三国共同应对朝鲜问题。三国应举行高级别会议，讨论对朝外交政策路线图，具体包括可让步的事项、加快谈判进程的方案、各方期望达成的协议等。

### **美专家建议美国修复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 12 月 3 日登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前高级主任迈克尔·格林（Michael J. Green）和中国问题专家格雷戈里·波林（Gregory B. Poling）的文章《美国与菲律宾的联盟》，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菲律宾政策提出建议。

文章称，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是美国在东南亚存在的重要支柱。但杜特尔特担任菲总统以来，美菲同盟的基础多次受到冲击。如果不恢复美菲间军事与政治关系的稳定，美国将难以实现维护海洋自由、在南海及周边地区遏制中国的目标。美国必须处理杜

特尔特政府侵犯人权和民主倒退的问题，但也应注意菲公众对双方关系不对称的感受，并意识到对前殖民国进行干涉的敏感性。

为了“适度”修复美菲同盟关系，文章建议：立即任命一位在菲律宾事务上经验丰富的新大使，表明对美菲同盟的承诺；让国务卿首次出访该地区时访问马尼拉，并且视情况就《访问部队协定》（VFA）附录进行谈判；在下次双边战略对话中提议设立一个工作组，以澳菲《部队访问协定》条款为出发点商定一份有关 VFA 刑事管辖权的附录；通过官方渠道直接向菲律宾提出人权和治理关切。

文章称，短期内进一步推动同盟关系的选项有四个：定期在巴萨空军基地和巴蒂斯塔空军基地进行联合演习；通知菲律宾政府，美国愿增加对菲空军现代化计划的支持，条件是菲方取消 VFA 废除程序并允许美国在《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所规定的五个空军基地开展更多建设活动；指示国防部和印太司令部在年度双边战略对话、共同防务委员会和安全接触委员会会议期间寻求讨论南海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指示国务卿私下告知菲律宾外长，美国将努力履行《共同防御条约》中第四、五条规定的责任。

### 美智库分析“Z 世代”对美外交政策的影响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近日登载《“Z 世代”如何改变外交政策？》的文章称，“Z 世代”与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对于外交政策具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美国下一代的观点和优先事项。文章摘要如下：

受多元主义和 21 世纪教育的影响，“Z 世代”给外交政策带来了不同的视角。他们从未生活在可能与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发生冲突的环境之下，因此，与战争或大国竞争相比，他们更担



心气候变化和人权问题。近半数的“Z世代”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将应对气候变化放在首位。“美国例外论”也并未烙印在“Z世代”的思想中。不足一半的“Z世代”支持美国因其全球领导地位而更强大的想法，与上一代人的态度相比，该比例大幅下滑。近半数“Z世代”倾向于在对华政策上采取谨慎和合作的态度。作为全球连通程度最高的一代，他们对于划分世界或强迫盟友选边站队没有兴趣。

为了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为美国的下一代服务，政策制定者至少需要在四个方面做出改变：一是必须重塑应对外交政策挑战的方式，学会与危机共存，并增强自身的弹性，在危机真正出现时给予强有力的回应；二是必须重设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摒弃过时的、家长式的“全球警察”形象，采取更有限度和谦逊的姿态；三是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全球伙伴关系，并使其多样化，以在不断演变的威胁面前保持领先地位；四是必须大幅增加美国年轻人在外交事务领域的认同，增加指导和培训机会，资助语言学习和文化交流，为学生投身公共服务事业提供奖学金和途径。

### **AEI：美国共和党的外交政策辩论将走向何方？**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网站近期载文称，共和党内部在外交政策上可以划分为三派，随着特朗普连任失败，共和党内部围绕外交政策的辩论将进一步激化。文章摘要如下：

共和党内部在外交政策上存在分歧。全美范围内的保守派和共和党人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群体：外交政策行动主义者（activists）、外交政策强硬派（hardliners）和外交政策不干涉主义者（non-interventionists）。

外交政策行动主义者支持美国建设海外基地、实施对外援助

计划和打造强大军队。他们认为美国在其主导的海外伙伴关系秩序中是领袖；他们愿意支持国际组织，面对美国对手通常不会让步；他们倾向于与美国盟友达成开放的贸易协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四五年前，共和党外交政策行动主义者在党派内部的外交政策辩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目前，在参议院中的代表人物包括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犹他州联邦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Nikki Haley）也是主要人物。

外交政策不干涉主义者反对在海外进行武装活动，认为美国的军事联盟带来的麻烦多过好处，并对向特定对手作出外交妥协持开放态度。他们呼吁撤销美国在海外的军事承诺，削减国防开支。这一群体虽未构成共和党选民的多数，但却是少数中的多数，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大流派：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和民粹主义者（Populist）。

自由意志主义者热衷于自由贸易，认为美国广泛的军事承诺是对公民自由和国内有限政府的破坏；民粹主义者更有可能是保护主义者，对针对美国特定竞争对手的强硬政策持开放态度。双方都对“无休止的战争”表示担忧。前者的代表人物有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后者的代表人物除了特朗普外，还有福克斯新闻的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

大多数共和党选民属于第三个群体：共和党或保守主义强硬派。共和党外交政策强硬派倾向于建立强大的美军、实行强有力的总统领导、制定有攻击性的反恐政策。在生活在美国农村、远郊和小城镇的保守派中，强硬派是最多的。他们在参议院的代表人物包括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得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和密苏里州联邦参

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随着特朗普即将卸任总统，过去的四、五年可能会被视为共和党外交政策传统中的一次反常，现在可以当这些年从未发生过，回到正常轨道上。然而，这可能是妄想。从一开始，格外强烈的美国民族主义就一直是共和党的核心特征。展望未来时，这一特征产生的具体政策影响肯定值得讨论，但这种现象远比特朗普个人严重，它会继续存在。

## 美国政治/其他

### 美刊：拜登与媒体的“蜜月期”不会持久

《政客》杂志 12 月 7 日载文称，经验表明，一般美国新任总统与媒体和谐相处的时间不超过 100 天，拜登也不例外。

拜登面临重大危机：新冠肺炎大流行和经济崩溃。不过，很难想象他的表现会比特朗普还要糟糕，因此其政府将有几周的“宽限期”。在新一届政府开始的几周内，总统及其团队通常表现良好，仍处于竞选模式，向选民兜售“光鲜产品”。11 月胜选的良好势头有时会延续到次年 4 月。并不是说媒体不愿攻击新政府，而是它们正忙着瞄准可能想要攻击的对象。此外，每一届新国会都会在混乱中开局，带来的新闻漩涡会转移人们的视线。

有一点注定会缩短拜登与媒体的“蜜月期”，那就是他从政近 50 年，1973 年进入参议院，担任过两届副总统，记者可挖掘的料很多。一些迹象已经显现，比如，媒体要求他解释早期的刑事司法立场、克拉伦斯·托马斯听证会和他与信用卡行业的关系。此外，口误、剽窃史、谎称因为探望纳尔逊·曼德拉而被捕的虚假声明等，都预示着拜登可能因愚蠢的措辞而结束“蜜月期”。

不过，不同于克林顿，拜登的竞选议程并不新颖，这将有助于维持他和媒体的蜜月期。即使有关医疗保健、气候变化、工会和枪支的提议落空，拜登也不会被追究责任。人们评判他的依据是新冠肺炎疫情，但很难想象他的应对会比特朗普还差。

## 身份政治在美国拉美裔中并不奏效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美洲项目高级副研究员玛丽安娜·坎佩罗（Mariana Campero）的文章称，美国拉美裔具有多样性，身份政治对于拉美裔人口并不十分奏效。

皮尤研究中心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拉美裔选民表示，经济、医疗保健和疫情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优先事项反映了美国普通民众的关切。移民议题对拉美裔选民的重要性往往被夸大了。2017 年的数据显示，67%的拉美裔在美国出生，近一半已经在美国居住 21 年以上。因此，移民改革在拉美裔的优先事项中排名靠后。但对于那些移民时间更短的人来说，这是更重要的议题。

虽然特朗普对墨西哥移民出言不逊，并将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儿童“关入笼子”，但在 2020 年大选中，拉美裔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从 2016 年的 28% 上升到 32%，与拉美裔对其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水平相当。

拉美裔对特朗普的支持随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在年收入低于 5 万美元的拉美裔家庭中，特朗普的支持率是 31%；在年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的家庭中，其支持率上升到 40%。但新冠疫情对拉美裔的打击更大，其死亡率几乎是白人的三倍，并导致失业率增加，这可能影响了特朗普在拉美裔选民中的支持率。民主党在拉美裔中的优势从 2016 年大选中的 38% 下降到今年的 33%，是自

2004 年大选以来的最低点。

美国的拉美裔人口自 1970 年以来增长了六倍，是美国最大的非白人选民群体。如果政客们将拉美裔人口归为单一少数族裔而忽视其内部的多样性，不仅会损害他们在拉美裔社区的选情，也会损害拉美裔社区。

### 美专家称美国应重新评估其出口管制政策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马基恩·拉塞尔（Maritijn Rasser）执笔的报告《出口管制再思考：意外后果和新技术地图》称，美国目前实施的出口管制政策会造成意外后果，损害美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力。文章摘要如下：

全球科技地图已经发生变化，美国不再像几十年前一样在全球研发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负责管理出口管制的机构并没有跟上全球迅速发展的技术的步伐，也没有反映当下的现实，这会带来六方面意外后果，包括：侵蚀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出口管制的影响会扩展至整个行业；其他国家会避免在供应链中使用来自美国的产品；给外国竞争者创造机会；为联合研发制造障碍；加快其他国家的科技本土化努力；给美国公司的长期规划带来不确定性。

为制定符合当前战略技术竞争的出口管制法规，美国政策制定者应遵循三条原则。一是与盟友合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口管制必须在多边基础上实施，需要一个或多个盟国和伙伴国的协调参与，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二是提高门槛。出口管制应首先作为一种促进和保持技术竞争力优势的战略手段，而不是为了获得让步的策略。以限制某国的技术本土化为目标的限制获取技术

的努力才最有效。三是重新定义目标。出口管制本身并不是目的，对下一代技术研发的投资需要同步进行，以便为打造持续的竞争力奠定基础。出口管制应作为整体国家技术战略和更广泛的经济国策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政策行为。

总之，美国当下的出口管制越来越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需要重新评估、设计甚至改革出口管制，以使出口管制政策适应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和技术环境的现实。政策制定者必须谨记，用多边方式进行技术限制应该是他们的首选。他们也应更谨慎、更具战略意义地使用出口管制。

### 盘点拜登经济顾问委员会人选的贸易政策观

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EA）是美总统行政办公室下设机构，职责是就经济政策向总统提出建议。美候任总统拜登的过渡团队近期公布了其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人选：经济学家塞西莉亚·劳斯（Cecilia Rouse）被提名为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和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将担任委员会成员。

卡托研究所网站载文梳理了三位候选人的贸易政策观点。从这些观点看，他们反对特朗普大规模征收关税，鼓励全球贸易，但同时对美国工人就业、贸易对象国的劳工和环境规则、“汇率操纵”等方面表达更多关切。三位候选人的贸易政策言论或观点分别如下：

#### 塞西莉亚·劳斯

劳斯 2019 年发表言论称：“我们的专业人士非常支持全球化和开放市场，而本届政府对此几乎不承认。我认为我们需要停下来：‘是的，开放贸易有赢家也有输家。’我认为它让这个

行业认识到，输家真的在遭受损失，而我们需要他们给予关照，并在国际贸易中采取更微妙的模式。”

### 希瑟·布希

布希在 2018 年与人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总体而言，认为贸易总体上有积极影响的经济研究认为，‘赢家’必须补偿‘输家’。否则，贸易扩张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因为海外竞争加剧将导致一些社区面临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下降。这些补偿包括帮助工人迁至有工作的地方，发展新技能，或者提供资金支持，直到他们找到另一份工作。然而，像联邦贸易调整援助 (federal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这样的项目远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1990 年至 2007 年，每年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增加 1000 美元，而该项目提供的人均补贴仅增加 23 美分。”

### 贾里德·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认为：“（贸易）是一种净收益，可以增加供应链、就业和商业，同时降低价格。但由于面临来自低工资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像我们这样富裕国家的工人和社区付出了巨大代价。”

“全球化不能也不应该停止。如果运作得当，通过增加商品供应，它会给发达国家带来巨大利益，同时，帮助提高发展中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

“在贸易上与中国竞争，要做的既不是全面征收关税，也不是徒劳地坚持要求中国改变其根本经济模式，而是要提高我们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并为那些被全球化甩在后面的人和地方提供真正的帮助。”

伯恩斯坦对贸易逆差感到担忧，但与那些贸易赤字鹰派人士相比，他的担忧更为微妙。他表示：“对一个国家来说，贸易逆差本身并不是问题。”“因此，贸易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在不扭曲当前贸易流动的情况下，扭转美国的贸易逆差。特朗普提议的大

规模关税不会起作用，也阻止不了公司将业务转移到海外。”

伯恩斯坦看到了贸易协议的价值，但同时担心“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贸易协议）为各国处理贸易物流、壁垒、跨境投资和冲突提供了必要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能够以有益的方式为全球化铺平道路。但它们也可能被党派或公司的利益所俘虏，从而将贸易好处转移到特惠群体。”

文章称，在贸易问题上，劳斯、布希和伯恩斯坦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咄咄逼人，也不会像特朗普那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或许，三位经济学家的重点将是利用国内政策来帮助那些他们认为受到贸易伤害的人，而不是把关税作为一种通用工具。同时，伯恩斯坦在一些贸易领域似乎相当激进，目前难以判断这将对拜登政府产生何种影响。